

子女角色效用及其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

李鹏飞

人口出生率是进行人口研究最基本的量值，它对研究人口发展规律和制定科学的人口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已有的资料和研究表明，社会经济是影响人口出生率非强制性因素中最根本、最持久的因素。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在社会经济对人口出生率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存在一个中间因素，它的变化发展受社会经济变化发展的影响，同时又对人口出生率产生十分明显和重要的影响，这个中间因素就是子女在家庭中所承担的角色效用。

所谓“子女角色效用”，我们可以定义为：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子女在家庭中所承担的职能、责任和义务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有用性。这是一个可变的概念，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涵。一般而言，我国现阶段子女在家庭中所承担的角色效用主要是：

(1) 劳动力效用。人们为了获得物质资料，维持家庭生活，必须从事一定的生产劳动，承担一定的家庭体力劳务。在家庭中，这些事情主要是由成年子女来承担的，成年子女作为维持家庭生计的劳动力，在家庭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 社会保障效用。由于我国在现阶段劳保福利还是一部分人的事，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发达，当家庭主要成员（主要指父母）在丧失劳动能力或身患重病，没有物质和经济来源时，他们所需要的照顾和赡养，主要是由子女来承担的。

(3) 血缘继承传宗接代效用。由于人们是按血缘关系来确定其亲属关系的，所以家庭中的子女还承担着传宗接代、繁衍下一代的任务。

(4) 宗法势力效用。宗法势力是一种旧的封建势力，当家庭或家族与外人或外族发生冲突时，它依仗家族的强大，凭借人多势众来维护本家族的利益和地位。由于近年来这种封建宗法势力在一些农村地区逐步抬头，家庭中子女的多寡也就愈加显得重要。

(5) 荣耀依托效用。荣耀感是人们的一种普遍心理，一般来说，子女也是人们获得某些荣耀的方式。在我国现阶段，多子多福、光宗耀祖、发家致富等观念普遍存在，这些荣耀多要通过子女获得，因此，子女在家庭中成了满足父母荣耀心理的一种形式。

(6) 感情依托效用。由于我国劳动人民的思想还比较朴素，生活方式还比较单一，子女在家庭中往往成为父母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为他们感情上的依托和生活中的最大乐趣，和联络夫妻双方感情的重要纽带。特别是老年夫妇，身边没有子女不仅在生活上会缺少照顾，而且在精神上会感到孤独和无趣。

(7) 隔代补偿效用。由于社会分工不同，在客观上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做父母的总是“望子成龙”，把自己没有实现的追求，没有获得的愿望，寄托在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上。

以上七个方面是我国现阶段子女在家庭中承担的角色效用的典型表现，其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人们的主观意愿，也就是改变人们的价值取向或主观选择来实现。

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一个家庭对孩子的需求，主要受到三个因素的制约。这三个因素是：子女将来在家庭中所承担的价值效用的大小；对家庭新消费的追求和选择；育龄妇女的生育条件。在现实生活中，育龄妇女的生育条件几乎是不变的（当然也有例外），而子女的角色效用和家庭新消费则是可变的，并且是相互制约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越来越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讲究舒适和享乐，在吃、穿、用、住、娱乐、享受等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的投资越来越大，然而，人们的时间、精力、资金总是处在不足状态，对子女和新消费的投入选择往往不能同时兼顾，因此不得不在生孩子和满足新消费之间作出选择。选择何者？那就要看何者对于家庭的现在和将来更重要。如果子女在家庭中所承担的角色效用比家庭新消费重要得多时，人们的价值取向就会导向孩子，人口出生数就会上升。在另一种情况下，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子女在家庭中所承担的角色效用被社会组织或家庭消费所替代，子女角色转变、效用降低时，人们的选择就会导向新消费，从而减少对子女的需求，降低人口出生率。例如，在农业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落后，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很低，生产主要依靠人力畜力，成年子女（特别是男子）作为劳动力的效用十分重要，人们便希望多生几个孩子，特别是多生男性孩子，以加强对自然、对各种灾变斗争的力量，人口出生率也就很高。在现代工业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大大提高，子女在家庭中的许多角色被替代或转变，生育孩子从追求数量转为追求质量；又由于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大大改变，核心家庭逐渐增多，人们希望把生活质量提高一些，也更加注重对孩子的培养。而医疗事业的发展，又为人们的这种选择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也就是现代工业社会人口出生率呈现低出生率状态的基本原因。由上可见，子女角色效用对人口出生率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联系当前我国农村人口形势作进一步的分析。

我国从60年代起就注意到控制人口问题，70年代对计划生育提出了具体要求，到80年代，计划生育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并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农村人口的控制仍是我国一大难题，严重困扰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什么农村人口如此难以控制？主要是因为农村子女在家庭中所承担的角色效用更重要，更具有不可替代性，换句话说，较之其他劳动者，农民更需要孩子。

第一，农村子女作为劳动力的效用更大，并且在目前社会经济条件下具有不可替代性。在我国农村，农村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进行生产劳动就没有经济和物质来源。由于农村生产力落后，机械化程度低，进行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人力畜力，有些生活必须依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男性劳动力才能进行，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另外，农民在日常家庭生活中也有许多体力性家务工作要做，如砍柴、担水、打米等，这些家务也需要重体力劳动者。特别是自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业生产由集体统一经营过渡到家庭分户经营，农业劳动力的作用就更突出，这当然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对劳动力的需求。由于农业劳动力的接替和补充主要来自农民子女，因此农民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就转化为对孩子的需求，农村人口出生率也就居高不下。

第二，农村缺乏必要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广大农民在青壮年时期是自食其力、生儿育女，年老或患病后就得依靠子女来照顾和赡养。据《1987年江西省老年人口1%抽样调查资料》，在对1396位农村老人进行抽样调查时，发现整劳动力者只有107人，占总数的7.66%；半劳动力者685人，占总数的69.07%；丧失劳动力的604人，占总数的43.27%。在对1399位农民进行供养状况调查，发现靠子女供养的有872人，占总人数的62.33%；靠自

已供养的有401人，占总人数的28.66%；靠配偶供养的有61人，占总人数的4.36%；靠亲戚供养的30人，占总人数的2.14%；靠政府供养的20人，占总数的1.43%；靠集体供养的15人，占总数的1.07%。可见，农民在步入老年后，绝大部分是依靠子女来赡养的。另外，农村落后的医疗保健条件，也强化了农村子女的角色效用。根据上述同一资料，在对676位农村老人进行就医状况调查时，发现无钱就医的有590人，占调查总数的87.28%；离医院太远的有67人，占调查总数的9.91%；查不出病症的19人，占调查总数的2.81%。说就医无困难的几乎没有。由此明显可见，农民在步入老年后，经济困难的多，患病的多，需要帮助照顾的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子女的作用，强化了农民对孩子的需求。

第三，农村文化教育落后，文盲半文盲人口比重大，原先由生产队组织的宣传学习在实行联产承包后几乎不存在了，农民开会学习的机会极少，与此同时，农村的封建迷信、陈旧思想、宗族观念等等落后的封建文化却乘虚而入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仍被许多农民视为人生的一大准则，他们不愿祖宗传下的“香火”断在自己手中，而“老来无子”亦被认为是自己最大的不幸。对许多农民来说，生个儿子比什么都重要。农村子女的这种血缘继嗣的效用，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农村人口出生率的上升。

第四，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着以众欺寡、以强欺弱、蛮不讲理、乡村干部调解不力，甚至调解不公、袒护强者的现象。如果家里人手不多，经常会受到所谓“大户”的欺压。有些乡村干部也因慑服于“大户”的势力不去主持公道。由于农民不能完全依靠行政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基本权益，诱发了农民多生孩子的愿望，农村计划生育工作自然也就更加难做了。

第五，由于农村的特点环境和落后的思想观念以及农民自身素质的影响，许多农民把多生孩子和生男孩子当作一种荣耀，互相攀比，谁家男孩多，谁家孩子有出息，谁家发家致富了，谁家就显得有福气，就可以光宗耀祖，做父母的脸上也就光彩。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到，正是农村子女的角色效用在目前条件下所具有的特殊性、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刺激了农民对孩子的需求，支撑了农村人口的高出生率，因此，改变子女在家庭中的角色，降低子女在家庭中的效用，不断努力用社会组织功能来替代子女在家庭中的角色效用，增加家庭新消费的供给，提倡新的生活方式，激发人们对新消费的需求，将会有助于我国农村人口出生率的降低。

前面曾经提到，子女角色效用的替代和转变，是受社会经济诸要素制约的，一般来说，社会越发达，文明程度越高，子女在家庭中的角色效用越不重要。从当前情况看，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使子女角色效用发生转变的临界点，我们当然也不能坐等这样一个临界点的到来，以求能自发地控制人口的增长。重要的是，这里应能找出促使子女在家庭中角色效用发生替代和转变的主要因素，以求有效地解决农村中子女的角色效用问题，并进而对降低农村人口出生率产生积极的影响。我认为，促使子女在家庭中的角色效用发生替代和转变的主要因素是：

(1) 机械化 (2) 城镇化 (3) 福利化 (4) 秩序化 (5) 政策优化 (6) 教育普及化。

第一，机械化的实现对劳动力角色具有直接的影响，它可以把重体力劳动者解放出来，降低子女作为劳动力角色的效用。由于减少了生产、生活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就会减少对孩子的需求。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第二，城镇化可以缩小城乡差别，打破城乡壁垒，实现农业工业化，使一部分农民转化为工人，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并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没有劳保福利的后顾之忧，同时也

能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改变农民落后的生活方式。由于对子女的依托感减少了，对孩子的需求也会随之降低。

第三，福利化（包括医疗保健的发展，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社会其它福利措施的广泛实行）可以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对社会保障的担心；把子女在家庭中所承担的劳动力角色及社会保障角色代之以完善的社会福利事业，会减少家庭对子女的依赖。

第四，秩序化（指社会的有序管理和行政管理）可以起到打击歪风邪气，减少民事纠纷，树立良好社会风气，起到有效防止以众欺寡，以强欺弱的作用。用组织的力量和行政权力来代替家族势力以维护人们的基本权力和利益，改变人们依靠和追求宗法势力的思想。

第五，政策优化可以降低人们对子女的依赖程度。例如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提倡发展各种合作经济和互助组，发展社会服务体系，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调济农村劳动力余缺不均的现象，有助于减少家庭对劳动力的需求。实行“老有所养，老有所为”的政策，有利于解除人们对社会保障不足的后顾之忧。实行保护孤寡老人及身边无子女老人的政策，有助于防止以众欺寡，防止某些“大户”依仗人多势众欺负弱者。

第六，教育普及化有助于改变人们的观念，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树立现代人口意识，接受和适应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改变人们的价值取向，从而减少对子女的需求。

总之，子女角色效用的替变，需要一定的宏观条件——机械化、城镇化、福利化、秩序化、政策优化、教育普及化。而人口出生率的自然降低，又必须有一定的微观基础——子女角色效用的替代或转变，降低子女角色的效用，改变人们的价值取向。但微观基础受宏观条件的制约，因此，影响人口出生率长远的、根本的因素是宏观条件。正因为此，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促进全社会的机械化、城镇化、福利化、秩序化，进一步发展教育，优化政策，将是我们为降低人口出生率而必须长期努力的目标任务。

（作者工作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
(上接第20页)

话，死亡率可以说是收入水平的简单递减函数。而影响生育率转变的因素很多，大致为：（1）妇女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提高；（2）从事非农业生产妇女的增多和生育、抚育的机会成本的增加；（3）传统的多子多福思想观念的转变；（4）城市化和核心家庭化；（5）教育的义务化和子女的经济价值的下降；（6）老龄保障与其他保障制度的发展；（7）社会的流动性增大，（8）婴儿死亡率的降低；（9）廉价而安全的避孕方法的普及。可以说，中国在上述9项因素的总体水平上均比印度强，甚至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但就单项因素来看，可能就不一定占绝对优势。总的说来，中国为典型的东方文化传统的国家，

她的生育率革命跟日本、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有许多共性，跟台湾、香港等地区更是一脉相承，这种外部环境造成中国这块大陆较早地实现人口转变。所以说，我国走的是先实现人口转变后实现经济腾飞的道路，这是由于我国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形成的，如果我们也走西方国家先发展经济后控制人口的道路，则必然会陷入“马尔萨斯困境”中去。

可以说，对生育率革命来说，我国的前途就是一条：必须继续严格地控制人口增长，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四化事业得以早日实现。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